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85

2008年11月27日

三評陳奎元院長的講話

深圳市新世紀文明研究會會長 徐景安

一、院長職能定位 是社科院改革的首要問題

2008年7月26日，陳奎元院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改革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討論決定的思路和舉措，不是尋常的工作部署，而是在我院進一步推進改革的重要決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驟，是深化改革的新開端。”讀罷陳院長的講話，我的第一反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職能是什麼？陳院長能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定研究禁區嗎？陳院長對改革開放、普世價值等問題的判斷能作為社科院研究的準繩和標準嗎？這是陳院長的個人見解，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決定？這一系列問題的背後孕含著

更深刻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一個學術機構該怎麼管理，怎麼才能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我國對意識形態的管理應採取什麼方針？

能用衙門規則來管理社科院嗎？

早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才來部署改革，不知是慎重還是遲緩？

中國社會科學院改革的目標、宗旨，是“推進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按理陳院長的講話，首先應該分析一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不起來的原因，重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辦院方針、制度安排、研究機制存在什麼問題，然後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革的方針、措施、辦法。而陳院長只說了這麼兩句：“機構龐大、機制守舊，整體創新能力不強”，“改革的力度不夠，照舊章辦事的狀況比較明顯，妨礙人才成長和科研成就的弊端大家均有所見”。本該進一步分析，機制怎麼守舊？照什麼舊章辦事？如何妨礙人才成長和科研成就？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找不到病根和原因，怎麼能作出正確的改革決策？怎麼能成為“深化改革的新開端”？看了陳院長的這篇講話，我領悟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機制舊在哪裡，照舊章辦事的狀況是多麼嚴重，自然妨礙人才成長和科研成就！恕我直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改革就應該從陳院長改起，從院長的職能定位改起！

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就要學習、研究、繼承人類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中央的《意見》說得很明確：“立足當代又繼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立足本國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陳院長也說要“瞭解世界理論、文化的動向，借鑒先進適用的文

明成果。”這就是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歷史還是現實，都有我們可學習、借鑒的東西。那麼，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普世價值。如果東西方文化中沒有普世價值，怎麼會“先進適用”呢？我們繼承什麼？怎麼借鑒？

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不起來的根本原因就是否認東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絕繼承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改革前，我們把傳統文化批作“封建主義”，西方文明批作“資本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社會主義的探討則批成是“修正主義”。文化大革命就達到了頂峰，批封資修，打倒四舊，結果只剩下打砸搶的野蠻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很大改變，西方的經濟、社會、哲學、文學成果大量引進，傳統文化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熱潮，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開展了新的研究。這是建國以來社會科學研究最活躍的局面。但是，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還處在照抄照搬階段，不是搬洋人，就是抄古人，或者是給中央提出的口號作註釋，或者是到馬克思的著作裡找論據。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裡有哪些是我們的創造？在世界論壇上我們又有多少話語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缺乏創新思維能力，是因為長期以來不允許思維、不允許思想。創新，首先要勇於繼承，敢於追問，能於發表，展開爭論，也就是有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然而，陳院長規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方向是“學懂古人”，把“國學研究論壇”做大、做響。並且思想還很解放，說：“藏傳佛教黃教的振興，標誌性的活動是宗喀巴舉行的祈願大法會，直到今天延續五百多年，達賴每年在境外主持祈願法會，甚至一年搞數次。民族文化不是宗教，但優秀文化的傳承、生命力的根基更厚重，關鍵在於需要有志於此項事業的專家堅忍不拔地代代相傳。”言詞中對宗教、對達賴，還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寬容

和讚賞。可是，一說起西方，他的語調馬上改變，說：“過去基督教宣揚其教義是普世價值，現在西方話語權的聲音高，把他們主張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等等也宣稱為普世價值，我國也有一些人如影隨形，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他明確表示：“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對普世價值問題，學術界爭論很激烈，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也是思想自由嘛！他可以專門寫個人的署名文章來參加討論。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會議上，作了這番講話，沒有表示是個人意見，沒有說明可以進一步討論，而是下了無容爭辯的結論。院長有裁定學術爭論的權利嗎？您怎麼確認您的意見代表真理呢？再退一步說，您認為這個問題重大，必須發表意見，那應該講道理啊？您反對普世價值，就講了兩個理由，一是基督教宣揚的教義，二是西方話語所宣稱的，之於他們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錯在哪裡沒有作任何分析，然後就得出反對與普世價值“接軌”、“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的結論，並且還警告“我們研究重大現實問題，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這樣重大理論、戰略問題上要清醒。”

陳院長在講話中專門提出，反對學閥作風，改掉衙門作風。說：“衙門根深蒂固，積重難返，各種明規則、暗規則，往往令人目瞪口呆。衙門風氣不除，施之於國則誤國，施之於事則誤事。”衙門作風就是長官說了算，其實衙門應該是長官說了算，不過他要實行民主、聽取民意。而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社科院不是衙門，不能是長官說了算，而我國將社會科學院恰恰是用衙門的規則來管理，陳院長從省委書記調任社科院院長已六年，完全沒有意識到職能的轉變，用行政命令的口氣對待學術研究，要求思想與長官保持一致。這怎麼能帶來社會科學的繁榮？

西方文明沒有學習之處嗎？

陳院長的通篇講話只提“學懂古人”，不提“學懂西方”，只講“弘揚傳統文化”，不講“借鑒西方文明”，作為個人的喜愛與偏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持這種傾向，就涉及到重大的原則問題，院長能規定社科院的研究方向嗎？能為社科院的研究規定禁區嗎？

陳院長說：“要學習的是先進文化而不是強勢文化。中華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獨領風騷，在這些方面我們並不弱，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所，都有理由慷慨陳辭。”按照這種說法，這個世界上，中國的過去好，“中華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現在的中國更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獨領風騷”，那就不是“理應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列”，而是“已經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根本就不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而是“世界學習中國文明”就行了，繁榮中國社會科學的任務不早就完成了？

可是，他又說：“在人文社科領域，所謂‘西強我弱’不可一概而論，要具體分析西方強在何處，我方弱在哪裡。”這就讓人不可理解，西方怎麼會強，我方又怎麼會弱？西方的普世價值一無是處，西方憑什麼強？我國既“博大精深”，又“獨領風騷”，又怎麼可能弱？他在2005年曾作出規定：進一步加強對院屬刊物的管理，不允許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自由發表”。既然禁止學習、借鑒、研究西方學說，還不准發表研究成果，怎麼又要“具體分析西方強在何處，我方弱在哪裡”，人家有這個膽嗎？還敢說“西方強”、“我方弱”，居然還要“具體分析”原因？

陳院長的結論是：“要學習的是先進文化而不是強勢文化”。中國自然是先進文化了，而且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就沒有先進文化。而西方又是強勢文化不在學習之列，並且是被陳院長明令禁止的。可是緊接著，他卻說：“在許多方面我們不如人家，或者人家有獨到之處，我們就要虛心學習，這不僅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而且是對全世界、全人類。”這個彎拐得太突然了，剛剛說“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所，都有理由慷慨陳辭”的我們，怎麼會“在許多方面不如人家”；剛剛說我們不學習西方的強勢文化，這裡突然又要向西方以至全世界、全人類“虛心學習”？這麼說來，西方還是有學習的地方，那就“虛心學習”吧。可是陳院長緊接著又來一句：“現在這方面的主要傾向性的問題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和過分崇拜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這麼一說，西方文明又不讓學習了？陳院長的邏輯混亂本來是他個人的事，但他說的是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要決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驟”，作這樣的決策和改革正確嗎？

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思想自由

哲學社會科學是人的精神、意識、思維的科學，它需要自由的廣闊的空間，獨立思考、獨立創造；它需要膽識、智慧和勇氣，對已往的、現存的懷疑和批判，對未來的設計和預測；它需要走在現行規則和實際運行的前面，探索、爭論、猜想。這不可避免地有精華和糟粕，有真理和胡說，有科學和夢囈，有真誠和邪惡……縱觀人類歷史，出現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創造了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縱然也有毒害人類精神的邪教一類，但畢竟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濁流和泡沫，無礙大局。

一個社會存在著兩個獨立的系統：實際工作系統和思想文化

系統，前者的任務是要維持秩序、保持運轉；思維的特點是關心眼前、務實求效；工作作風是上下一致、照章辦事。而後者的任務是批判現實、暢想未來；思維的特點是好高騖遠、求異創新；工作作風是不懼權威、不受約束。前者的本質要求是遵守規矩；後者的根本特性是自由開放。這兩個系統並行不悖，才能把現實與未來銜接起來，維持秩序和思想創新統一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而長期以來我們的做法是要求後一個系統與前一個系統保持一致，後一個系統只能為前一個系統的決定作宣傳、作解釋，當好秘書、當好下級，這就完全取消了後一個系統的批判功能、創造功能，使得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既跟不上我國的實際需要，又全面落後於世界水平。

我國人口衆多、資源短缺，正在探索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需要東西方智慧的互補和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對傳統文化採取虛無主義態度是錯誤的，對西方文明一概否定的歷史錯誤更不能重犯。陳院長以反對普世價值為名拒絕西方文明，還加上“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禁止研究、不准發表，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許多所應該關門，只要剩下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所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就可以了，最多加一個西方情報所。這是繁榮還是萎縮社會科學研究？

陳院長問：“具體分析西方強在何處，我方弱在哪裡”？答案很簡單，西方實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當然，西方的自由是相對的，沒有也不可能有絕對的自由。西方的研究、言論、出版也受利益集團的控制，但西方是多黨制、多個利益集團，還有各種私人基金會，只要弄到錢，有人支持就可享受自由的權利。推崇馬克思也好、主張社會主義也行，不反對無產階級自由化。有了自由權利，人才會有創造力。所以，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西方都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我方弱在哪裡？就

是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禁錮、保持一致，怎麼會有社會科學呢？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基本人權，寫進了我國憲法。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基本職能應該給研究人員創造自由研究的環境，保障他們自由研究的權利。陳院長肩負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但不能違憲剝奪研究人員自由研究的權利。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就是普世價值，而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恰恰不懂普世價值、還反對普世價值，導致一系列判斷、決策的錯誤，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我還要提醒陳院長，您反對普世價值的言論並沒有與黨中央保持一致！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報》刊登溫家寶總理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時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經胡錦濤主席親自審定的文件則有更明確的表述，中日發表的“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北京奧運會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為主題語，這都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普世價值觀的認同。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的您，卻公然反對，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化呢？

還必須指出，按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個人不能凌駕於組織之上。您的發言有否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的討論？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早就批評了這種現象：“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用個人領導代替集體領導，

在黨和政府部門裡是錯誤的，在社科院這樣的學術機構更是要不得的。陳院長一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強調要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並說：“共產黨的力量來自於組織，黨員個人永遠要立足於組織之中，決不要以為自己有一技之長，或者有一定的聲望，就可以替代組織的力量。”教訓別人容易，約束自己難，陳院長的通篇講話對主持社科院六年來的工作沒有一句作自我批評，字裡行間覺得比誰都高明。然而，我卻挑出了不少毛病。我相信，您的部下與同事只是不敢說而已！

看您的簡歷，我與您都生於 1941 年，大學畢業於 1964 年，共同經歷了前後改革的時代，應該說不存在代溝，但觀點卻很不相同。而您擔當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重任，我只是保留了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興趣。由於事關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冒昧陳言，請予批評。

二、打著改革旗號部署反對改革

2008 年 7 月 26 日，陳奎元院長在部署中國社會科學院改革的會議上，發表反對改革的講話。陳院長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反改革的部署。作為一個學者對改革持任何見解都可理解，但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如此敵視改革，並以此在院的工作會議上進行部署，陳院長的“自由化”真是嚴重得可以。然而，他卻口口聲聲要反人家的“自由化”。

他說：“在改革的問題上同樣也要弄清楚一個問題：搞什麼樣的改革，怎樣進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質，打著改革的旗號，企圖取消黨的理論基礎，圖謀褫奪黨的領導權力，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提倡這樣改革絕對不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和平演變的圖謀。講改革，如果脫離

黨的基本路線，違背黨的理想信念，背離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導致一系列難以控制的後果。我們決不贊同那樣的改革。”

陳院長這裡說的“有些人”是指誰？如果是一些“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人，他們怎麼有能力“取消黨的理論基礎”、“褫奪黨的領導權力”、“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陳院長所指的“這些人”，顯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實際領導權的人，“這些人”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反改革的先鋒人物馬賓就直言不諱地說：“鄧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新領導班子沒有挽狂瀾即倒，依然在積極推行鄧小平江澤民的錯誤路線。”馬賓由此得出結論：由於黨中央的“錯誤路線”，“在短短的幾年，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臨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¹

與馬賓不同，陳奎元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對30年改革持否定態度，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陳院長反對改革的立場、態度、觀點十分鮮明，我的疑問是他在改革中實際做了什麼？陳院長高調提出有兩種改革觀、兩種現代化，一種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觀、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另一種是資本主義的改革觀、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從1992至2002年您主政西藏、河南兩地達十年之久，您是中國改革的執行者，又是地方的最高決策者。那麼，請問您推行了什麼樣的改革？實行了什麼樣的現代化？

按照陳院長的高度無產階級覺悟和對資本主義改革危害的清醒認識，您一定是抵制了錯誤的改革，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那就把您的經驗推廣、介紹全國。您是中國社會

¹ 馬賓：〈對於形勢與任務，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注意掌握大局！〉，載馬賓著：《論形勢與任務》2006年2月（打印稿白皮書），第105~106頁。

科學院院長，派人總結一下經驗是很容易的，怎麼至今沒有這方面的調研報告呢？看來，您還是忠實執行了這場錯誤的改革，明知危害社會主義而為之，那就應該深刻反省。您卻說了一句“決不贊同那樣的改革”，把應承擔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要知道，您一直是當事人，而不是局外人。

我只能假設，當時陳書記推行了錯誤的改革，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後覺悟了，力圖把中國改革拉回正確的軌道。那麼，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年，又做了什麼呢？理應組織社科院提出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案，可至今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研究報告。“我們中國社科院的人才濟濟、位列參謀諮詢的重要機構，作智囊團體是本分”，“始終要探討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既然“人才濟濟”，又自知“作智囊團體是本分”，更有陳院長的正確領導，六年過去了還在“始終探討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連“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都還不清楚，您又怎麼高談社會主義改革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說空話、唱高調是所有反改革派的共同特點，可是陳院長一直是工作在第一線的人，我非常好奇當年您是怎麼做領導的？當了十年省委書記，天天喊搞社會主義，結果搞了資本主義。當了六年院長，又天天喊搞社會主義，結果還是不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既然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一直沒搞明白，那就應該謙虛一點，但指責、反對改革又那麼言之鑿鑿、錚錚有詞。

陳院長還說：“看實際情況，現今黨員幹部中貪腐分子滋生的狀況、人民群眾怨憤的心理、黨群關係緊張的狀況，我看是建國以來少有的局面。每一個珍惜黨的事業、關心黨的前途命運的人，都不應置若罔聞。”這講的是實話。對存在的問題，改革派與反改革派的看法沒有區別，分歧在於原因的分析與推出的結論

不同。陳院長說：“有一些問題不是由公有制或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比如，現實生活中的腐敗問題能怪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體制嗎？”² 在這麼關鍵的問題上，陳院長只反問了一句，就沒有下文了。我又要冒昧地質問，既然您認為“每一個珍惜黨的事業、關心黨的前途命運的人，都不應置若罔聞。”那您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應該組織人好好研究，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該採取什麼對策？怎麼輕飄飄地說一句“不應置若罔聞”了事呢？社科院每年這麼多課題費是怎麼花的？“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研究成果不准發表，什麼是社會主義至今找不到答案，關係黨和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也回答不了。我問責陳院長嚴重不作為，退一步說您作為改革的反對派也不稱職，沒有反出水平來，怎麼提出問題，又不作回答呢？

腐敗是怎麼產生的？這是不難回答的。關鍵在於陳院長還未研究就下了結論，“腐敗問題能怪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體制嗎？”言下之意，腐敗是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帶來的。很有意思的是這段話恰恰是陳院長在〈調查研究要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談話中說的，這是聽了多少年的老話了。先定立場、觀點，再去調研，用各種方法證明預設的立場、觀點正確。這也就是陳院長找不到腐敗產生的正確答案的原因。

我試著來回答。實行市場經濟就是自由買賣，無非是談價錢，怎麼會產生腐敗？當然，商業腐敗是可能的，與政府權力應該沒有關係，也決不會引起黨群關係的緊張。這就與改革開放之前的體制密切相關。在計劃經濟、公有制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資源。市場化改革，就是將資源從政府控制下進入市場，這就為權

² 陳奎元：〈調查研究要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中央國家機關團工委編：《汝當上下而求索》，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力換金錢提供了機會、渠道，所以腐敗與改革同時俱進，每一次市場化改革必然伴隨腐敗的昇級、暴富的誕生。而財政分配又掌握在各級政府手裡，既不公開、又不透明，說輕一點是“監守自取”，說重一點是“監守自盜”。每年國家審計局都審出一大堆問題。而教育、衛生、醫療、養老、低保等事關民生的問題不予重視，民意既沒有反映的渠道，又沒有反映的組織。黨員幹部、政府官員成為改革成果的最大享用者，公款吃喝、出國、買車就化費近萬億，民衆自然怨憤。這是改革之前的政治體制來不及改革造成的。正因為如此，學術思想界與廣大民衆呼籲推動民主化改革進程。而您把此作為“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反對。您預設了反對市場化改革與民主化改革的立場，極力維護前體制，所以把腐敗氾濫、兩極分化、群眾怨憤、黨群緊張都說成與改革前的體制無關，一古腦兒把罪責推向改革，然後批判改革、否定改革。

說您否定改革，您也許會聲辯，我對改革是肯定的。您說：“沒有人能夠抹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整個社會發展水平的態勢是水漲船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上普遍提高，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³ 我國改革既然取得如此成就，那麼，您反什麼資本主義的改革觀、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呢？您憑什麼危言聳聽地提出警惕“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⁴ “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後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⁵

您也許會說，我是指出改革存在的問題，怎麼是反對改革呢？

³ 陳奎元：〈調查研究要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中央國家機關團工委編：《汝當上下而求索》，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⁴ 陳奎元在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發言，參見《人民日報》2004年8月27日，第6版。

⁵ 參見《人民日報》2004年4月20日，第9版。

您說：“不能籠統地認為：凡是以改革名義發表的文章和言論，甚至於有些政策措施，一經出臺就不必再討論，就永遠不需修正”。⁶ 這是對的，必須正視面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但關鍵是對問題性質的判斷和今後的主張，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錯了，因此要倒退回前體制；還是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進程。陳院長顯然是前者。他一再強調反對資本主義改革、資本主義現代化，又說不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其實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是不改革，他所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計劃經濟、公有制。所有反改革派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這個基調、主旋律都一樣。所有反改革派，都不願接受這頂帽子，他們把退回去稱為改革。如此而已。

三、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之我見

2004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時隔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會議部署改革，自然應以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為中心議題。但陳奎元院長的講話以及上任以來一直以萎縮、限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為宗旨。問題出在哪裡？作為一個執政黨究竟怎麼管理意識形態，一直沒有進行反思和檢討，一直沒有提到改革的議事日程，一直沿用在思想領域實行專政的做法。以至今日，陳院長依然可以以權力代替真理，對學術爭論作裁定，對社會科學研究劃框框。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陳院長個人的問題，是黨對意識形態管理的大政方針問題。

⁶ 陳奎元：〈調查研究要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中央國家機關團工委編：《汝當上下而求索》，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是辦“社科院”，還是“神學院”？

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以社會主義為目標。作為一個執政黨自然希望將所追求的信仰轉化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並實現所奮鬥的目標。全世界所有政黨和宗教都是如此。人類社會的進步也就為此付出了代價。

歐洲中世紀，宗教以國家世俗權力實行思想強制，並設立宗教裁判所對思想異端判罪，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布魯諾就是這樣被燒死的。西方人文主義是對宗教神學的反叛，追求思想自由、精神自由，首先是信仰的自由。人可以追求來世、彼岸的精神幸福，也可追求現世、此岸的物質快樂，將人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西方文明崇揚自由主義，把信仰自由作為至上原則。從此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不能干涉人的信仰自由，政府也不能干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美國一所大學發生這樣的事，學校讓學生祈禱，某家長控告學校，稱我的孩子不信上帝，為什麼要規定做祈禱？這個學校只好作罷。如果這個學校是神學院，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你不信上帝就別來啊！所以，神學院是沒有信仰自由的，大學有信仰自由，民衆有信仰自由。

西方國家的執政黨是通過法律來執行意志，不能干涉思想的自由。不過，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研究機構自然是幫共和黨、民主黨說話的，各財團控制的媒體是幫利益集團說話的，各私人基金資助的研究機構也各有宗旨，大學的研究相對自由一些。能弄到錢，有人資助，也可以組建共產黨，宣傳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說它是假的，有道理，西方的思想、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說它是真的，也沒有錯，西方沒有哪一個黨、哪一個人敢禁止哪種思想，不准哪種言論發表。正是實行資產階級

自由化，創造了相對自由的環境，所以西方出了眾多的思想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帶來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斷翻新，什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各種學派林立，什麼貨幣學派、制度學派、比較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公共選擇學派；資本主義模式多種多樣，什麼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統治技巧不斷改進，尤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中，吸取了很多社會主義理念和做法。

中國共產黨在野時，也是爭自由和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一個主義。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發表評論說：“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一批進步青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就是嚮往自由和民主。毛澤東也盛讚“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認為“人類最可寶貴、最堪自樂的一點，即在於此。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中國什麼‘師嚴而後尊道’、‘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兩千年偶像的

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⁷ 1944年11月15日《新華日報》刊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問時說：“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權，我們就忘了當時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口號、革命的承諾。也許是出於建設人間天堂的崇高動機，但是不能用棍子趕人進天堂。因為既然是建人間天堂，那什麼是天堂，怎麼建天堂，大家有權來討論。至少人家可選擇不進或退出。但我們居然採取全面專政的手段，來建人間天堂，人民既沒有人身自由，更沒有思想自由。一旦失去自由，人間天堂就可能變成人間地獄。我們有過這樣一段痛苦的實踐以後，應該有起碼的共識，不管它有多美妙的理由、多崇高的目的，都不能禁止人身自由，更不能禁止思想自由。

30年的改革，中國人獲得了人身自由，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思想自由。各種學派林立，思想十分活躍，尤其西方流派在學術思想界影響日甚。面對這種狀況，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如劉國光等，驚呼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受威脅，要求運用行政權力限制西方學派，甚至提出要對大學、研究機構的領導人進行清理與整肅。這篇2005年的談話正是發表在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一年之後，並專門引用了陳奎元院長反西方學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右的觀點。⁸顯然，這是劉國光與陳奎元的一次聯合作戰。這就可以理解陳院長今天的講話，他從上任之日起就一直不是把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己任，而是作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方統領。直白來說，陳院長要辦的不

⁷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頁。

⁸ 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8月23日。

是“社科院”，而是“神學院”。

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是怎麼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思想界，在中國民衆中，包括共產黨內部已不佔據領導地位。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開會時的共產黨人與飯桌上的共產黨人判若兩人。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引起深深的憂慮是自然的。之所以造成這種狀況，正是因為長期實行思想禁錮的錯誤方針。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失去了營養源，也沒有了戰鬥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背誦教條、詞句以外，失了起碼的思維能力，既不能解釋中國發生的現實變化，更提不出預測、指導未來的意見。劉國光當時一方面埋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另一面又承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還不夠成熟，數量也不多，沒有引起學生廣泛的興趣”。三年過去了，這種狀況有沒有改變呢？還是沒有。⁹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如何管理意識形態，可以說，只有失敗的教訓，沒有成功的經驗，是非常值得反思、總結的。我們只有承認這個簡單事實，才能真正反省。用專政的手段禁錮思想自由，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方針，不僅不能帶來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更造成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危機。60年的實踐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嗎？

作為政治偉人的鄧小平提出“經濟為中心”，是為了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即發展經濟，來不及、也不可能討

⁹ 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8月23日。

論意識形態的問題。恰恰相反，他採取排除干擾的方針。1979年3月，在理論務虛會上，不少人以文革為據質疑共產黨領導、質疑馬克思主義、質疑社會主義。這種狀況如果蔓延，政治局面就穩定不了，經濟改革也無法進行。鄧小平就在這個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後又提出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用以排除右的干擾。他又提出著名的“貓論”、“摸論”、“不爭論”，避開姓社姓資的爭論，用以排除左的干擾。鄧小平的用意，就是穩定政局，發展經濟。今天，經濟是發展了，但政局卻不穩。這就是陳院長所說：“現今黨員幹部中貪腐分子滋生的狀況、人民群眾怨憤的心理、黨群關係緊張的狀況，我看是建國以來少有的局面。”但陳院長並沒有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一味地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下功夫，乞求禁錮思想的老辦法來穩定局面，這已不管用了。

如何重建意識形態？

當下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的總根源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對共產黨自身來說，失去了信仰的作用。如今共產黨的吸引力，不是信仰追求，而是權力利益。所以，怎麼進行先進性教育都不管用。沒有信仰追求，哪能產生自覺約束的力量？對廣大民衆來說，失去了價值引導的作用，政府以發展第一，民衆以掙錢第一，並由黨政官員帶頭幹消解了一切道德。現在，黨管不住黨，政管不住官，官管不住民，民管不住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了信仰、精神、理想、道德，這是最深刻的危機。重建意識形態是當今中國的頭號重要問題。

首先，要在共產黨內重新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信仰是必須真信，不能假信。要真信，就要經得住追問。宗教是對來世的

信仰，是“誠則明”，首先是虔誠，靠宗教徒的熱誠來傳播和維繫的。馬克思主義屬於現世的信仰，是“明則誠”，首先是明瞭，靠真理、實在、美好來贏得信徒的追隨。馬克思主義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對未來世界的設想曾經鼓舞了一代人。今天現實世界已有了很大改變，對未來世界的追求也遭受過挫折。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就要去發展它、創新它，而不能固守過時的教條。馬丁·路德破除了必須通過教會才能信仰上帝的教條，主張人人心中就可有上帝，正是這場宗教改革運動，挽救了基督教，並且使基督教廣為傳播。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後，也進行了改造，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適應，所以流傳至今。任何一種信仰，都需要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正是推動創新的動力與壓力。

馬克思主義要創新，一定要迎接各種思想流派的挑戰，既從中吸取營養，又在辯論中推進認識。用國家權力宣佈非馬克思主義為毒草，西方流派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神經虛弱、缺乏自信的表現。當年，馬克思主義是這樣誕生的嗎？今天，馬克思主義能這樣發展嗎？就憑這一點，可以認定劉國光和陳奎元對馬克思主義是一竅不通。謝韜用民主社會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是重建信仰的可貴努力和嘗試。民主社會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在價值理念上與社會主義的目標一致，在歐洲的社會實踐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用來解釋中國30年的改革與推進未來的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作為歐洲社民黨信仰的民主社會主義，能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是可以討論的，但被教條主義以違背四項原則為由粗暴打壓。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王占陽教授，從區分價值社會主義與結構社會主義入手，也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創新研究，取得了突破與進展。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過時，共產黨重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可能的。阻力就在於陳奎元

一類只知道背誦四項原則的原教主義者。其實，他們是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最大敵人，也是置馬克思主義於死地的主要危險。

其次，要重建國家意識形態。所謂國家意識形態是指政府所倡導、國民所認同的主流價值觀。這裡必須說明，作為共產黨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與作為國民所遵循的價值觀，有聯繫，也有區別。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自然必須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理念，但馬克思主義不能強制作為國家的信仰、國民的信仰。信仰自由是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我們對意識形態管理的全部錯誤歸結為一點，就是違背了信仰自由。馬克思主義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強制。你不信馬克思主義就退黨。對國民來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然可選擇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不可以利用國家權力進行思想強制。但長期以來，我們實行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把全國辦成神學院，誰不信馬克思主義，就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問罪。從反右鬥爭到文化革命，死於思想罪的不知多少？今天，對意識形態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方針依然沒有改變，黨章是規範共產黨的，憲法是規範政府與民衆的，但憲法中卻用共產黨的信仰來約束民衆。就拿四項原則來說，這只能是對黨的約束，怎麼能強制民衆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呢？對民衆來說，好，就擁護；不好，就反對，不存在要堅持的問題。共產黨既然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哪有僕人強迫主人接受服務，而不論服務好壞；商家強迫顧客購買商品，而不論質量高低；包工頭強迫業主認可設計，而不論方案對錯的道理。陳奎元院長就是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則，把社科院當神學院來辦，居然為研究劃禁區。

之所以必須實行“政教分離”，是因為黨的意識形態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一種思想規範，不能用來約束非黨的民衆。國家意識形態是倡導的價值觀，是人的行為規範。國家意識形態作

為制定制度、法律、道德的共識，自然要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必須吸收人類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批判的理論武器與未來社會的構想，缺少具體的制度設計、法律規範與倫理體系，吸取西方文明與傳統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執政黨應該下的功夫。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五百年的西方文明，反映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人類美好未來的設計，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人類文明中一切美好的東西，不會排斥、拒絕，相反是兼容、借鑒。所謂人類文明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就是普世價值。把人類的文明宣佈為封資修，在空地上建設所謂社會主義文明，被實踐證明是一種愚昧與野蠻。作為中國社科院院長不懂普世價值，反對普世價值，起碼是缺少文化素養，怎麼能擔當繁榮社會科學研究的重任？

本人從事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研究，自認為取得了進展。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權，就是承認愛自己、鼓勵愛自己、保障愛自己。我們過去搞社會主義，就不允許愛自己，這是錯誤的。傳統文化倡導的孝道仁愛精神，就是愛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寬厚待人，誠信對友。社會主義的原意就是集體的、公共的、社會的，也就是維護公共利益。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愛大家。要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嚴格法治、保護環境、愛惜資源。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繼承了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五百年的西方文明、二百年的社會主義運動，既堅持社會主義，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可成為中國新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理念。

具體措施和建議

重建意識形態，今天已是關係共產黨存亡的首要問題，也是

穩定社會、推進改革的關鍵。只有提高到這個高度，才有可能進行意識形態管理的改革。

黨校應成為重建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研究基地，並負責黨政領導幹部的培訓。吸收既有學術功底、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作為基本研究隊伍，採取開放式研究，與各種思想流派展開平等討論，歡迎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與挑戰。馬克思主義可分為價值與結構、理念與手段、目標與途徑，從價值、理念、目標來說大都是正確的，而錯在結構、手段、途徑。並且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的都是落後國家，在推行中，馬克思主義正確的部分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錯誤的部分被擴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是將錯誤發展到極致，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目標。鄧小平理論糾正了忽視發展經濟的錯誤，來不及從理論上進行全面清理，更不要說重建。而現在一些人又簡單地以堅持四項原則作為評判標準，本來如何堅持、堅持什麼就是重建的內容。不克服教條主義的干擾，就根本完不成重建的任務。所以，重建馬克思主義信仰，同樣需要實行思想自由、研究自由。重建馬克思主義信仰，當然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但如何重建馬克思主義信仰卻是個學術問題。動不動就用四項原則來打壓，不區分政治與學術，是重建的大敵。黨校對黨政領導幹部的培訓，應採取案例教學與研究的方式，中央黨校以國家級案例為主，省委、市委、縣委黨校則以省、市、縣的案例為主，以培訓、提高各級領導的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改變從中央到省、市、縣黨校千篇一律，同唱一個調，同說一種話、同學一篇文的形式主義。

社科院應承擔重建國家意識形態和繁榮社會科學研究的任務，這只有在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制度環境中才能完成。黨和政府提出的重大問題作為研究課題，社科院必須完成。其餘由各

研究所和研究人員自主研究。社科院院長的聘任需要改革，由組織部門確定兩名以上的候選人，由全國學科帶頭人組成的學術委員會進行評審，然後投票決定。院長的主要職責是保障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創造良好的研究環境。院成立學術委員會，負責重大課題的立項與學術研究工作的指導。

大學應實行更充分的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但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必須徹底改革。現在按什麼級別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作為評審依據，級別越高的刊物，管理越嚴，越要與中央保持一致。製造大量無創新思想的學術垃圾成了各大學、各研究機構、各研究人員評職稱、獲獎勵的動力。中國的大學越昇級，學術水平就越低。中國的教授、博士、研究生越多，就越貶值。應成立各種專業學科的學術委員會成為評審機構，不是評數量，而是評質量，一篇有創新思想的論文就足以顯示一個人的研究水準。

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在人口多、資源缺的條件下進行現代化建設面臨許多難題和挑戰，這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提供了可貴的素材和迫切的需求。克服僵化的教條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就可能迎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與發展。